

## 第五章、由網際網路論對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中的認同問題

### 第一節、關於大陸市民社會的認同問題

經過前兩章的探討，我們認為認同問題是市民社會理論的最核心概念，參與市民社會的討論，本身就是對相同認同的肯定，因此硬性區分國家與社會的分立，明顯忽略了國家認同仰賴著市民社會對其的界定。網際網路以使用者為分析單位，以網際網路探討市民社會問題，無疑使個人抽離了國界的不同，置身於網路世界中的認同尋求，以下將就此一問題作探討。

#### (一) 認同政治的提出

##### 1. 什麼是認同

認同(identification)是一個心理上的過程，係一主體將他人所有之經驗、特性、屬性收納為用，並以客體作為模仿的對象，進行部份或全部的行為及心理上的轉變。按照 Weeks 的看法，認同分為個人的認同(personal identity)與社會的認同(social identity)兩種<sup>1</sup>，前者係指自我的建構，即個人對獨立個體自我觀感，以及如何認知自己並瞭解他人眼中的界定，後者係指個體如何將自身安置在所生存的社會環境中，以及認知他人如何安排自身的處境。社會認同可從「價值認同」和「角色認同」來解釋，前者係指個人對社會上是非善惡的評判標準，以及如何使個人對道德規範觀念意識等與社會相調和，簡而言之，價值認同是個人對社會價值判斷的學習過程。

角色認同則指個人在不同時空下所應表現的行為標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因所處環境的不同，需要表現各種他人所期待的角色扮演，包括性別、年齡、階級等客觀因素，都會限制個人在行為標準上的自由。簡言之，社會認同仰賴他者對個體的界定，它是在社會不斷地變動中尋求自我與他者的不同，因此與第三者的劃清界線，就成為認同樹立的通常手段，而對認同的最大威脅，則來自於第三者界線的穿越以及與他者間區隔的模糊<sup>2</sup>。

現代社會的快速變動使得認同成為浮動的概念，Hall 認為現代社會

---

<sup>1</sup> Max Weeks, *The Value of Difference*, in Jonathan Rutherford(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Wishart, 1990).

<sup>2</sup> 石之瑜，*政治心理學*（臺北：五南，1999年），頁175。

的認同是「破碎且經組合而成的，是多元而非單一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懸而未決的一種多重認同<sup>3</sup>」，這種流動、多重的後現代認同，使得個體因此產生分裂人格。人在性別、年齡、身份上的舉動，仰賴著他者對其的界定，認同穩定界線的要求，使得各人的行為有所依循，不致有「荒腔走板」的表現。但後現代的認同企圖打破這些限制，使得同性、雙性取向衝擊異性觀的道德界限，破壞、血腥、寫實顛覆了藝術原所要求的均衡美感，對個體來說，善惡與美醜本就共處一身，如今流動的認同使得個體不再有得依循的角色，自然在精神上難以適應。

因此在後現代的今天，認同包含了多元與分裂兩個面向，既然認同的建構不能再由單一來源確定，探究認同的本質就不再具有意義，這勢必對角色的扮演與社會價值的確立產生混淆，認同的提出並非為求新秩序的實現，它所喚醒的，不過是不能再硬性的由對他者的確立來界定認同，而應正視自身具有多元、互異的發展特性。

## 2. 國家認同

以國家角色來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認知形象，國家為確立它的認同，就需要經由不斷地儀式或典章制度確立。在天朝時期，中國對外需要經由朝貢、討伐、宣揚天下來樹立文明形象，而對內則需經由儒家、科舉與宗法來確立文化認同；而當進入主權國家後，又轉由排除外患、建立民族意識來強化內部認同，而以面子外交、懲罰戰爭確立對外形象，認同的浮動概念使得主體必須不斷地經由他者的反應來確立自己，並依此而改變形象<sup>4</sup>，使得整個認同過程形成一循環反饋的界線尋求。

主權國家的認同分對內與對外，對內需要國人對其的效忠，因此遊牧、少數民族等沒有主權觀念者，就必須在原有的部族聚落觀念上將國家放在最高的位階，而國家則相應的擬定政策，彰顯主權國家對少數民族的認知<sup>5</sup>；對外則須排距外國勢力的干涉，維持並藉此區分本國的特殊性，與對內統治的至高性。為求區分明確，他者多半是與自身相近的政治實體或是國際列強。人們或許不瞭解國家在這過程中的利益何在，但

<sup>3</sup>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and T. McGrew(ed),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276~277.

<sup>4</sup> 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 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臺北：五南，1995年），頁32~36。

<sup>5</sup> 石之瑜，「論宜州水族身份的能動性問題」，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5期，2002年5月，頁65~71。

透過對內與對外的運作，個人卻可因此加強對國家的認同<sup>6</sup>。

Bradley 對文化認同方式的劃分，或可供作參考，他將其分為被動主動與政治性三種<sup>7</sup>：

- a. 被動的認同(passive identities)：個人不會對被動的認同有特別的感受，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種認同只是屬於一種潛意識的產物，除非他人刻意提出，個人是不會對此有特定的觀感。
- b. 主動的認同(active identities)：個人不僅感受到，也會以行動為其建立基礎。就好像父母對孩子的期望，使得小孩必須以聽話、活潑，表現身為孩子的身份認同。
- c. 政治化的認同(politicized identities)：當認同已構成一持續性的身份建構時，就已成爲個人的政治認同，換言之，就是主動認同的持續化。例如總統出國訪問時，就須以身爲一國代表的身份表彰該國特性，所以許多非裔國家元首出國訪問，就常以該國裝扮出席。

可以發現，認同的表現有其強弱，認同的形成需要尋求他者的存在，而認同的表現是可以在後天中不斷去更易的。對一個國民來說，他自幼生長在家鄉，平日以母語進行交談，在印象中，沒有對母語的使用有何特殊的情感，但當他學習另一種語言時，就會逐漸產生比較的心理，在運用上，它會避免混淆外來語與母語的語法，這時他對母語的認同還停留在比較的情境，然而當他至外國，在久不聞母語的情況下突然遇到同鄉的人，此時母語的溝通就成爲彼此相同認同的尋求，在意義上就已進入政治性的認同。國家的認同也是循此途徑逐漸演變的，因此當外力侵逼的情況時，其反抗與認同的區隔也會愈強，且隨著時間的遷易，它的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內涵。對中國來說，主權國家的觀念不過是這一百年來的發展，從天朝觀到民族國家，中國的認同正試著由文化的優越轉往國界的不可侵犯，因此對國界的不可侵犯，就成爲政治認同的表現，這段認同的學習過程，將由以下再作論述。

## (二) 文化霸權的提出

<sup>6</sup> 石之瑜，政治心理學，頁 187~188。

<sup>7</sup> Harriet Brandley, *Fractured Identiti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25~26.

### 1.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

一改馬克思的國家社會觀所突出的政治經濟學層面，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則將市民社會理論導入了政治文化的層面，葛蘭西被稱為西方近五十年來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他繼承了黑格爾與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是體現個體性與個體利益的領域，必須學習團體行動的價值以及彼此互賴的重要性，進而參與國家機器的運作，所以在黑格爾來看，國家是公益之所在，為一超越階級的公共權威<sup>8</sup>。而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部份，葛蘭西並不贊同恩格斯所說的經濟與市民社會等同的觀念，因為這將導致經濟化約論的困局，忽略了市民社會在政治文化的引導作用。市民社會也是上層建築的一部份，葛蘭西因此提出「完整國家」的概念，將其分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兩個部份，政府機關以及各種強制性機構，均屬政治社會的範疇，也是統治集團施政的所在；而各種民間組織，包括政黨、工會、教會等，則為市民社會。在政治社會部份，統治階級要求統治，在市民社會部份，則要求精神和道德領導，也就是文化霸權<sup>9</sup>。

因此，統治階級的根基並非僅限於國家機器的掌控，市民社會在意識型態、文化上的掌控更關係著統治者的合法性。在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以後，市民社會與國家就已合為一體，國家若受到外力侵犯，市民社會馬上就會穩固政治社會的掌控權。葛蘭西因此以陣地戰和運動戰做比喻，認為陣地戰適用在市民社會領域，以強奪市民社會的優勢主導權為優位，而運動戰則適用於政治社會，以奪取統治權力為依歸<sup>10</sup>。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若想要奪取政權，就只有兩個方法：一是在市民社會中建立自己的領導機構，二是創建自己的文化意識型態體系，葛蘭西並舉俄國等落後的東方國家為例，認其由於缺乏市民社會的存在，無產階級可以運動戰的方式贏得政權，但對西方國家來說，其市民社會已然成熟，除非採取上述兩種方法，否則會因資產階級對市民社會所附加之意識、文化，而陷於消極困頓之狀態<sup>11</sup>。

<sup>8</sup> 李英明，中共研究方法論（臺北：揚智文化，1998年），頁139~140。

<sup>9</sup> 何增科，「市民社會與文化領導權：葛蘭西的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3年第3卷，總第4期，頁28~29。

<sup>10</sup> 陳思宇，葛蘭西的現代國家理論（臺北：文星，1987年），頁146。

<sup>11</sup> 陳思宇，葛蘭西的現代國家理論，頁30~31。

可以發現，葛蘭西將焦點集中在國家是教育者的層面，國家以干涉的立場塑造了市民社會，也使無產階級甘於受到資產階級國家的掌控，所以市民社會不再如馬克思所認為的由下至上成為政治社會的發展基礎，兩者係處於有機的互動模式，也因此，革命的成功必須建立在社會的各層面，而非單純的打倒國家<sup>12</sup>。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思想主要仍限於階級，而未及性別、種族、等問題，範圍亦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這在身處全球化，主權、疆界日益模糊的今天，勢得有所修正<sup>13</sup>。他對後世的啟發，以波蘭的民主化最著，許多人認為團結工聯就是利用了市民社會這塊領域，塑造了一與共黨相對立的集體意識，最後才奪取政權成功，因此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也可採相同模式<sup>14</sup>。

## 2. 後殖民的文化霸權觀點

將文化霸權的研究轉移到後殖民的研究，以薩依德(Edward W. Said)最著，在其「東方主義」一書中，認為西方在認知中將東方文本化、定性，使得西方無法以全面、深入的心態審視非西方文化，長此以往，西方人在文化論述中將東方妖魔化了，而非西方自身則視西方為導師，也把自身文化「他者」化了<sup>15</sup>，文化霸權影響了西方社會的想法，再藉由文化、傳媒的傳播影響了非西方自身的文化認同，使得非西方在擺脫殖民地位多年後，文化和經驗上仍不能割斷殖民宗主國對其文化認同的束縛，成為西方文化宰製的對象。

文化霸權成為認同感建構的助力，對他者的偏見鞏固了西方對其的文化認知，也使非西方轉而經由西方的觀點自我詮釋。非西方的文學不再由自身的文化背景去檢視，轉而以西方的觀點探察其深層意識<sup>16</sup>。對非西方國家來說，現代民族國家並非是其土生的文化觀念，然而國家的建

<sup>12</sup> 黃秋龍，葛蘭西與馬克思國家理論之比較研究(警大警政所碩士論文，民79年)，頁120~122。

<sup>13</sup> Kate Nash 著，林庭瑤譯，當代政治社會學(臺北：韋伯文化，2001年)，頁8。

<sup>14</sup> 對此李英明認為，波蘭的團結工聯在過去就已深入至政治社會，八十年代只是增強其合法性，以有利於對市民社會的滲透，故政治社會的民主化反優於市民社會的效果。參見李英明，中共研究方法論，頁149~151。

<sup>15</sup> 薩依德(Edward W. Said)，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1999年)。

<sup>16</sup> 周蕾以末代皇帝一片，對西方將中國文化的女性化、他者化做論述，在片中中國文化成為陰柔須矯正的客體，而拜電影的傳播力所賜，中國人自身反以此詮釋自身的中國角色。參見周蕾，「看現代中國：如何建立一個族群觀眾的理論」，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1999年)，頁318~361。

制卻可促成國族意識的紮根，因此非西方藉由領土、主權的劃分，形成了領域內的文化霸權，要求國民在認同上係屬於同一國族。就主權上而言，非西方國家似乎排拒了西方的侵略，但在文化上，非西方反成了西方文化霸權下的產物。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普世主義的提出，科學與客觀的檢證，使得知識應具備內在的一致性，就如科學實驗般，在排除了幹擾因素之後，實驗的結果應該相同，因此所謂的社會科學在排除了國情、民族性、文化傳統之後，其知識系統也應如自然科學般有一標準答案<sup>17</sup>。普世主義讓西方在文化傳播上充滿自信，既然西方是科學精神的發源地，那麼西方社會的知識經驗自也應適用至非西方地區，鼓勵非西方國家共同邁往現代化的道路。因此伴隨著對自身文化的優越感與傳教似的企圖心，普世主義與帝國主義成為最好的搭擋<sup>18</sup>，這使得非西方國家在接受西方觀念時，總是不由自主的萌生抗拒<sup>19</sup>。

然而，後殖民論述並非因此認為非西方國家將喪失自我文化的論述能力，傳媒科技的發展，如今的文化滲透已使東西方出現了互為轉化的效果。今天，那種以民族主義試圖將自身與他者區隔的本質主義心態已受到了淘汰，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文化霸權、認同不再是固定的概念，任一國族都已與他者相混雜，形成一多元化的身份認同，以他者樹立認同的一方，很可能也正被他者化<sup>20</sup>。後殖民論者要注意的是，如果硬性的區分誰為殖民者，誰為被殖民者的話，將滯限了多元論述彼此互動的空間<sup>21</sup>，論述的世界是由許多不同的聲音所組成，如何善用傳遞論述的管道，才是探討文化霸權形塑的主軸。網際網路的出現，標誌著掌握資訊傳播優勢者正扮演下一階段的霸權主導，同時，文化霸權不再限於群體間的認知問題，只要掌握資源和技術，個人亦將成為文化霸權及認同的建構者。

<sup>17</sup>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Malabar, FL: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 1982).

<sup>18</sup> Fredic Jameson, 「現代主義與帝國主義」，張京媛主編，前揭書，頁 1~21。

<sup>19</sup> 普世主義的宣揚並未稍歇，它與非西方間的衝突形成了東西方在文化認同中的衝突因數，包括民族主義、宗教信仰等，都成為普世主義的阻礙。參見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1997年），第八章。

<sup>20</sup>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2000年），頁 152~154。

<sup>21</sup>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troduction*. (London: Allen Lane, 1978), p.100.

### (三) 大陸市民社會的認同觀

對未有市民社會觀念的中國文化來說，對市民社會的反應與詮釋成為認同形象的再建立<sup>22</sup>。中國的國家的概念並非伴隨國家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形成而出現，也非本土的傳統產物，它是在西方文化衝擊下的一種論述回應<sup>23</sup>，我們在之前第三章已說過，傳統中國只有天下觀而無國家觀，所以對外邦的政策在強盛時採朝貢，在衰弱時採羈縻，並無現代外交的觀念。因此當國家觀念因西方文化刺激而起時，所謂的民族意識自然與國家觀念迅速結合，形成一種國族主義，民族不再成為具彈性的詮釋客體，而成為一受疆域制限的認同概念。

這個認同的危機係在立國之本與強國途徑的矛盾下展開的，既然立國的儒家道統無法因應時代的變局，知識份子就應採取另一救國的思維方式，這種救亡圖存式的想法，使得中國社會的合法性一直處於混亂的局面，喪失了傳統社會的穩定力量，然而這些不同的主義或觀念論述，皆以國家富強作為追求的目標，使得主權國家因此成為合法性與認同建構的基礎。對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爭論根源就在於此，就西方國家而言，市民社會成為文化霸權的根源，因此資產階級在政治社會受到挑戰時，還能維繫自身的統治地位，這導源於其市民社會的認同建構，係由市場文化認同來引導的；但中國不同，國家在資本市場、推動文化轉型上，都扮演著主導的地位<sup>24</sup>，在認同的建構上就形成市場—國家—文化認同，甚至國家—市場—文化認同的結構。因此在文化認同的討論上，西方所呈現的多元論述對話，在中國社會的表現就成為一動輒得咎的討論空間，因為每一次的爭論都成為對國家認同的質疑。

也就是說，市民社會成為國家塑造合法性來源的場域，國家自不可能讓市民社會的討論挑戰國家的認同。這就能解釋為何大陸學界或者官方對市民社會的討論，都必然提到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引導作用。如果市

---

<sup>22</sup> 對非西方國家來說，形塑認同的模式並非相同，以印度來說，Chatterjee 認為印度的現代國家認同，係由上層知識份子與下層的牧民階層共同打造出來的，是建立在既有社群上的後殖民社會，故在角色認同上呈現混淆；但中國不同，他自始至終都是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做論述，在觀念上有很強的國家中心色彩，因此前者強調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對社群的覆蓋，後者強調市民社會在灌輸國家觀念中的手段運用。參見沈松橋，「國族主義運動與國家型態及性質」，陳光興編，發現政治社會（臺北：巨流，2000年），頁123~130。

<sup>23</sup> 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份子（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頁27。

<sup>24</sup>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7期，2000年3月，頁1~44。

民社會係因資本市場所肇起，那麼國家就應站在不壓抑市民社會成長的角度，而無需對它的扶持。

我們由此來看公共領域的發展，如果中國傳統的道統觀，使得公私領域成為個人內心道德虛矯的不同表現，那麼對天子的崇敬與私底下天高皇帝遠的心態，就可證明現代化並不會扭轉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公領域的討論不過是個人內心一種高道德的展現，本身不具任何意義<sup>25</sup>。但今天社會自主力量的興起，對公共領域的重視已促使大陸人民希望有一公開的政治議論空間，這就使得原先的廟堂之事成為開放性的公民議政，個人就必須將自身的觀點侃切提出，於是如何制定一制度性的溝通管道，就成為人大改革、歷次民運的肇因，公私領域的虛矯道德就必須戳破。

然而，這之間摻入了列寧黨國體制對傳統政治觀的顛覆，就中共而言，原先的道德虛矯在黨體制的滲透下，轉換成黨組織的一部份，所以個人對國家的回應就不能採過去相應不理的模式，非得以積極的行動響應黨國體制的號召，所以在公私領域上雖不分，但意義卻與過去大不相同。如今的社會自主力量若要擺脫這層束縛，自然使黨國體制受到威脅，所以為維持滲透的優勢，就必須打開參政網絡，讓資本家及知識份子進入黨組織，而不致造成國家與社會的對決格局<sup>26</sup>。可以發現，對公共領域的討論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議論空間，中共仍會設法將政治事務限制在黨內的參與途徑中。

在意義上，兩者都是種集體優於個體的表現方式<sup>27</sup>，個體的意見表達需要立足於集體的認同下才能展開。在過去，個人必須以蒼生為念，壓低對私欲的尋求以換取群眾對他的信任，如今道德期許成為對國家認同的積極建構，個人如果不以國家發展為依歸，不僅是人格的瑕疵，更是對國家認同的挑戰<sup>28</sup>，因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要求的個人意見與利益的

<sup>25</sup> 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臺北：元照，2002年），第七章。

<sup>26</sup> 因此雖然政改的角步落後，大陸學界與官方仍鹹信擴大參政範圍，以漸進方式進行人大民主化的改革，是增強政權合法性的良方。參見趙建民、張淳翔，「中共全國人大黨政關係與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前景」，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2期，2000年，頁1~12。

<sup>27</sup> 有關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論述，參見石之瑜，中國大陸研究（臺北：三民，1995年），頁50~70。

<sup>28</sup> 因此一種有趣的對比出現在兩岸的國家認同，在大陸，國家認同關係著民族的強大與外力的排斥，故對台獨的思維，直認是對民族認同的挑戰；而在台灣，民族認同在歷經傳統中國、日據時代及國民政府統治後，已呈現多元紛雜的情況，民族認同反成為島內認同純化的過程與名目，



表現，即便在經改後，仍不能得見於中國社會。

照這樣的發展，中國大陸是很難培育真正的公共領域，當傳統與現代兩者的抉擇成為政權合法性的原因時，政治事務的討論就必得在黨國體制下才能進行。九十年代以後，政治上的肅殺氣氛更使得知識份子刻意對政治事務保持著距離，自古至今，知識份子受到經世致用的影響，其立論宗旨一直無法擺脫政治意識的羈絆，人文獨立的精神無法培養起來，只要政治風聲一緊，知識份子就頓失立足，獨立批判的精神無法樹立，公共領域的討論就不可能真正落實理性探討多元意見的要求<sup>29</sup>。對在彼岸的台灣來說，公共事務的討論因事涉國家認同而泛政治化，但對大陸來說，政治事務的討論則在民族與國家認同的要求下，成為另一種民族自豪的表現，既然推行改革的共黨已掌握了中國現代化的走向，那麼它的存在就已深化為整個國家的認同，故個人若不依循這項思維發言，勢將構成政權合法性的威脅<sup>30</sup>。

這樣的論述突出了一個管理意義上的思維，後殖民論述的研究，不僅包括再現體系的殖民，也包括了管理體系的殖民<sup>31</sup>。原先市民社會與國家認同的觀念，牽引了非西方學者在適用西方學理至中國本土研究時，竭力避免一被殖民的語境，如果中國自我認同的建構非得仰賴非西方在知識源泉上的供給，那麼即使之後依賴黨國力量形塑成功，也不免會受批為喪失自身文化的主體性。然而若將視野放在治理層面來看，今天就市民社會建構與公共領域的尋求，其過程就成為一種立國統治的立基點，著重的是對國家管理層面的需求，故每一次對大陸市民社會的討論，就成為統治管理上的規範尋求。

是故當市民社會理論適用至中國時，避免線性思考尋求本土政治意識的接受，就成為大陸市民社會理論為何如此難以界定的原因，這似乎陷入了一種普世主義與相對主義間的紛爭，然而如果學者認為大陸有其特殊性，不能照搬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話，那麼為何不大膽的宣稱市民

---

因此主觀切割歷史的遺緒反成為認同建構的重要指標。參見施正鋒，「台灣人的國家認同」，<http://www.taiwannation.com/taiwan12.htm>。〔2002/12/22〕

<sup>29</sup> 除人文素養的培育不足外，主流地位的傳統集體潛意識與待遇偏低，也是造成知識份子怯於發聲的主因。參見吳榮鎮，「當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價值取向」，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主編，中共建政五十年（臺北：正中，2001年），頁361~385。

<sup>30</sup> 祖治國，9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臺北：致良，1998年），頁144~146。

<sup>31</sup> 姚人多，「傅柯與殖民主義：從殖民論述邁向殖民治理性」，發表於台灣文化研究年會（東海大學），2002年，全文見<http://tsa.sinica.edu.tw/>。

社會理論不符中國國情，而非得以相對主義為護身符，企圖詮釋自己的特殊性？同樣的，西方學者在明白市民社會本就是個歷史背景下的政治文化，為何又要設法尋找大陸已有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存在呢？對前者來說，相對主義的概念表面上是修補了普世主義的缺失，但實際上，以相對來修正普世，反強化了對普世價值的認同<sup>32</sup>；而對後者而言，相信社會科學是科學一環的潛在心態，阻礙了他們以客體為主體的論述抉擇，因此若否認大陸有市民社會的因數，反而批判了自身認同的依據，追溯來說，兩者不過是市民社會霸權論述下的不同反應者<sup>33</sup>。

## 第二節、網際網路對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中認同問題的影響

### （一）新認同的掘起

#### 1. 跨國性社群對國家認同的沖擊

就一個虛擬社群來說，使用者必須選擇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以維持各種身份及階層的分工合作，故整個虛擬社群彷彿現實社會的翻版。然就實質內涵來說，這很可能只是主角潛意識的投射，也可能是一種想像的促發，並不能遽以認定使用者在現實社會的立場。然而當他透過虛擬空間對話時，就已成為現實社會發展的一部<sup>34</sup>，透過彼此的串聯，議題的討論形成各種網路上的副文化社區，這些不同國籍的使用者因相同理念而結合，形成對主權上的穿透，他們施壓的對象是現實社會中具有明確疆域與組織的政府，但他們負責的對象卻非該國的國民，而係所屬的虛擬社群，這無疑讓虛擬角色與現實社會產生衝突<sup>35</sup>。

這種跨國性的議題討論並非在網路出現後才發生，在過去就已出現。以環保為例，環保本為跨國性的全球議題，對其擁護者而言，環保運動已形塑了全球市民社會中的環保公民，以落實面而言，環保訴求最終仍

<sup>32</sup> Sandra Harding,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Postcolonialisms, Feminisms, and Epistemolog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92~194.

<sup>33</sup> 對認為中國大陸應發展出具有大陸特色的市民社會理論者而言，其表現類似於「反身東方主義」的立場，即承認大陸的落後，卻排斥照搬西方社會的作法，而堅信應採適合中國特色的途徑發展。參見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第三章。

<sup>34</sup> 例如有女性傾向的男性使用者，透過網路就可以女性身份參家對談，影響女性主義的發展，許多同性戀團體礙於現實社會的壓力，就常以此來互通訊息、結交社群。參見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臺北：揚智文化，2001年），頁132。

<sup>35</sup> 美國近年爆發的數起青少年殺人事件，如可倫拜(Columbine)高中事件，就突顯了網路影響青少年認同的問題。參見「網路犯罪面面觀」，<http://taiwan.cnet.com/internet/nettrends/story/0,2000020525,20000292-3,00.htm> [2003/4/20]

須經民族國家的決策才能執行，因此環保公民熱中各國的政治參與<sup>36</sup>，故就其代言者而言，代議士制度明顯面臨了政治責任的矛盾，環保公民若仍以民族國家的現實利益為考量，顯然未符環境經營(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的期許，然若符合，環保代議士顯然背棄了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

很顯然，環保議題這種新社會運動已對主權國家構成了認同衝突，環保公民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形塑了「我群(we)」的認同，當資源與訊息不再由政府壟斷後，我群必然利用各種隱匿網絡(invisible submerged networks)為其行動、權力爭取資源，所以我群對政治系統的顛覆根本上就是種認同的鬥爭<sup>37</sup>。的確，跨國社會運動需要國家政策的落實，但國家卻非其運動過程中唯一的效忠對象，這種新的公共議題空間，與其說是對本國市民社會的不信任，倒不如說市民社會與國家間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公共議題空洞。

因此，跨國性議題的出現，逼使主權國家必須調整主權結構，引進跨國或全球性機制共同處理國內事務，就國際法而言，這並不表示國家主權的獨立至高性受到質疑，國際上的決議仍需要透過內國的立法轉換，才能成為具拘束力的國內法律<sup>38</sup>，但就主權的發展來看，主權已由威斯特法利亞體系進入了互賴主權的向度，主權觀念的低降成為了國家對國際事務提高發言權的前提，也就是說，全球化讓主權概念開始與國家權力脫鉤，新社會運動既然可以利用資訊流通將影響力深入各國，國家自也能循此途徑增強自身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故就此來看，跨國性議題的提出並不一定減損國家行為者在國際社會的份量，它所衝擊的主要在主權概念<sup>39</sup>，以及主權所塑造的國家認同，這促使國家適時調整步伐，以跨越主權的思維擴大吸收國外公民對它的認同。

## 2. 網際網路對認同的影響

<sup>36</sup> Kata Nash, 林庭瑤譯, 當代政治社會學(臺北: 韋伯文化, 2001年), 頁229~231。

<sup>37</sup> 這方面的觀點評述, 可參見 Alberto Melucci,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a Sociological Misunderstanding," in L. Maheu (ed.),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Classes: the Future of Collective Action*. (Sage: London, 1995).

<sup>38</sup> 俞寬賜, 新世紀國際法(臺北: 三民經銷, 1994年), 頁95~96。

<sup>39</sup> 當然, 跨國性次政治組織也將與國家相同, 成為全球性的權威主體, 在議題的處理上, 也將由從上至下的統治概念, 改以由下至上的治理結構, 這種多元主體的決策模式, 並非遽認國家主體將逐漸受到淘汰, 正相反, 國家反可因此利用隱匿網絡, 讓國家影響力超越其本身的實力。參見張亞中, 「全球治理主體與權力的解析」, 問題與研究, 第40卷第2期, 2001年, 頁3~6。

由網路所引發的跨國性議題，其性質卻與上述跨國社群迥異，在訊息聯繫上，跨國性社群確實利用網路增強了隱匿網絡的連結，然而網際網路卻有如下特殊處：

- a. 權威結構無法在網路社會實現。治理雖不同於統治，但如何落實卻須仰賴現實社會的組織結構，網路使用者不受權威的限制，可隨時替換所屬的虛擬社群，而虛擬社群有時並非求取意見的落實，它很可能只是同好與認同的尋求，藉以逃離現實社會的束縛，在一個不存在權威的領域，治理又如何實踐
- b. 虛擬社群的極端性很難落實公意的尋求。對個人而言，得先得到肯定才能進而追求利益，全球化時代重新檢驗了各種議題，這種反思性的社會現象，自然使得人們開始思考定位為何<sup>40</sup>，由於選擇的多元化，使用者在網路上就必須突顯自身的獨特性，如此一來，自我肯定的尋求反而得先經由誇張、極端的方式加以扭曲，不利於社會意見的整合。

因此，網際網路不僅沒有強化全球化社會的治理、整合功能，反而加劇了全球化的危機<sup>41</sup>，相較於新社會運動對主權國家認同的衝擊，網路社會勢將更趨強烈。柯司特在比較目前社會中各種認同型態後，提出了三種界定<sup>42</sup>：

一是正當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會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他們對社會行動者的支配，此符合各種不同的國族理論。

二是抵抗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由支配邏輯下處於被貶抑或汙名者所產生的認同，他們有著共通的敵人，在不同或對立於既有社會體制的原則上尋求認同。

三是計劃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指當社會行動者基於他們所能獲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新認同，以界定其社會位置並尋求社會結構的改造。

就柯司特看來，正當性認同產生市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正是一群被結構化及組織化的社會行動者，它們在生產合理化其結構性支配來源的

<sup>40</sup> Anthony Giddens, 李惠斌、楊雪冬譯, 超越左派右派(臺北: 聯經, 2000年), 頁 91~99。

<sup>41</sup> Ulrich Beck, 孫治本譯, 全球化危機(臺北: 台灣商務, 1999年), 頁 15~18。

<sup>42</sup>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夏鑄九等譯, 認同的力量, 第一章。

認同，因此它一方面延續了國家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面則深植於人民。至於第二種抵抗性認同，則促成了社區的形成，它通常建立在從歷史、地理或生物等清楚面向以使抵抗邊界本質化的認同基礎上，所以就少數族群來說，強勢認同塑造了疏離感，因此強調本身的特殊並以自決等方式凝聚向心力，就常成為少數民族樹立認同的方式。最後在計劃性認同方面，認同的建構成為一「不同的生活」的計劃，以被壓迫所生的認同為基礎，計劃性認同的建構就是個人轉化成社會主體的過程。

網絡時代對權力與時空的分離，使得正當性認同受到顛覆，逐漸由以流動、特定為尋求的社區認同所取代，原先形塑計劃性認同的市民社會遂轉由社區認同來執行。柯司特強調正當性認同的根本危機，在於承繼自工業革命的民族國家與市民社會體系正迅速瓦解中，因此以抗爭性為取向的社群認同脫離了市民社會的掌控，並各自成為封閉的認同體系，這似乎可以解釋網際網路中的社群運作為何總是偏於極端，因為多元龐雜的價值認同，讓使用者只能由另一封閉的認同取向，尋求自我肯定的來源。

所以，有兩種力量正在拔河，全球化的力量讓人們以為普世價值正撲天蓋地的襲來，強大的資訊散播者將自身價值觀滲透進個人的認同觀，它針對的是以主權為範疇的國家認同，個人只好遊走於國界內外；本土化的力量則與全球化力量相抗，個人在失序的情況下，既不能追溯原來的國家認同，只好以宗教、嗜好及各種議題重構認同，所以全球化的力量愈強，本土認同的需求也愈強，國家在這之中反成為全球化狂潮中流離社群的庇護所<sup>43</sup>。

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認同的混淆關係著權力的下放趨勢。就韋伯的想法，現代國家獲取權力的方式是藉由壟斷管理機制取代原先的君王統治，因此理性的科層制官僚(rational bureaucracies)成為龐大的國家管理機構，對資本主義市場而言，追求利潤的極大化需要理性的決策模式輔助，然而如果全然交由科層官僚負責，市場機制將受到國家官僚的壓制，反而架空產權私有化所帶來的現代民主體制<sup>44</sup>。是故，現代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就是希望在市場與官僚間取得平衡，韋伯認為議會民主制雖然號稱

<sup>43</sup> 戴維 莫利、凱文 羅賓斯，*認同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2001年），序言。

<sup>44</sup>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150~154.

背負著民意的付託，但實質上卻是管理菁英的指導規則<sup>45</sup>，民主制度不過是少數政治菁英間權力鬥爭的手段。

網際網路的發展打破了這層限制，權力的賦予不再由現實社會的少數菁英把持，任何人都有可能因虛擬社群的連結獲取現實社會的影響力甚至權力，民主議會制也不再成為民意表達的唯一場合，網路民主成為熱烈討論的公共話題，可見網路打破的是資本主義的政經體系，它並非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延伸。在意義上，就好像工業革命對農業文明的衝擊一般，不僅社會結構與資本的生產方式產生變革，在認同上也起了顛覆性的影響。

## （二）網絡社會的認同觀對大陸市民社會理論的影響

這種顛覆認同的發展對中國大陸來說，自然形成極大的挑戰。照說經改的推行是因毛時期的動盪已動搖了黨國體制的合法性，所以亟待經濟上的成長換取群眾的認同，而在認同替換的前提下，民族主義自然成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指標。另外，中國的民族認同並非是本身自發而起，它是在外邦入侵下的痛苦覺醒，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得不藉由主權、疆界的確立與宣揚國權的運作下，謀求認同的建立。故在他者的定位上，民族認同有著濃厚的歷史仇恨，而在自身特殊性的維持上，則仰賴悠久的文明與領土空間為範圍的主權認同。

所以在心態上，經改的推行是塑立國族認同的契機與手段，這就是為何在反和平演變和歷次的學潮中，總夾藏著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然而矛盾的是，經改所面臨的全球局勢是正在激烈進行的網絡社會，它所形塑的認同是顛覆正當性認同的社區認同，國界與空間所加諸的權力正是其穿透的目標，是故，當改革進行的愈深化，本身的國族認同也會受到愈大的衝擊。

我們借用柯司特的理論，在傳統中國時期，認同的來源是儒家文化所形成的天朝體制，權力的結構仰賴對道統的尊重以及宗法的輔助，天朝無需龐大的官僚機構，就可憑藉士紳與知識階層進行帝國的管理。進入清末以後，外力的侵逼讓中國的文化受到顛覆，士人開始尋找新的認

---

<sup>45</sup> Anthony Giddens, *Politics and Sociology in the Thought of the Max Weber*, (Macmillan: Basingstoke Houndmills, 1972), p.38~39.

同來源，於是富國強兵與壯大民族，成為新認同的確立標準，而各種主義成為奪取認同的手段。當共黨奪取政權之後，遂利用黨國體制將自身的認同進升為計劃性的認同，它透過的手段並非市民社會主導權的掌控，而是由層級組織下達所致，所以相對於葛蘭西認為的市民社會成為文化霸權的基礎，黨國對基層的滲透反成為中共政權確立認同的根基，此也是為何中國大陸強調國家對市民社會的主導，以及其為何遲未發展出一較具自主性的市民社會。

是故，當網際網路興起以後，學者反有錯覺將產生一自主性較高的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忽略了網絡社會的社區認同迥異於市民社會的正當性認同。柯司特認為中國的權力結構向建立在中央、省及地方菁英對權力及財富分配的細緻平衡上，因此就算面臨網絡社會對國家認同的衝擊，中國大陸在未來可能將不致發生如蘇聯解體般的情況<sup>46</sup>。柯司特的觀點與其立論恰好成一明顯的對比，網絡社會的社區認同是採一種基本教義派的模式，所以稀化了正當性認同，中國在中央—地方權力分配上所發展的細緻平衡，並不能因此認為中國有能力應付這種去中心化的發展，因為國家概念對中國社會來說是需要形塑且還未成熟的，因此在穿透了主權疆界後的中國社會，其仰賴國家組織的認同建構將使其無法再如過去般達到分而治之的效果。

也因此，中共為何會這麼注意網際網路以及網絡社會對大陸社會的影響，它一方面需要藉此與全球社會接軌，一方面又怕資訊的傳遞超過其所能控制的範圍。就前者而言，與龐大的全球華人資本市場接軌，是大陸經濟成長的一大助力，也是利用全球化加強民族認同的手段，以民族主義為取向的中國大陸，很能喚起海內外華人的向心力，成為全球化浪潮下的認同避風港；但就後者而言，網際網路就好像塑造一批批流民或網路移民，他們不以國家認同為依歸，在心態上純粹是為謀求更好的生活環境<sup>47</sup>，故對國家的效忠反成為其次。

拉長視角來看，過去中共利用的列寧式黨國體制，在推行經改後受到了衝擊，與黨組織相伴隨的計劃經濟既已遭市場經濟取代，那麼為重新掌握經改所帶來的社會流動，就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故在意識型態上，

<sup>46</sup> 曼威 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夏鑄九等譯，認同的力量，頁 298。

<sup>47</sup> 曼威 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夏鑄九等譯，千禧年之終結（臺北：唐山，2001 年），頁 335~339。

結合民族主義並拉高黨所扮演的領導角色，故對外以反和平演變排斥外國勢力，對內則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許，企圖形塑共黨統治的正當性代表<sup>48</sup>；而在基層的紮根上，則以村委選舉與人大選舉重新對地方基層展開滲透，利用民主集中制防止多元意見的脫逸演出；循此邏輯，中共亦重視市民社會的發展，藉由對市民社會的主導，使日後市民社會反成為國家認同與政權掌控的助力。

是故，在形塑認同的過程中，中共仰賴組織層級化的模式，讓共黨的正當性認同與黨組織結合在一起。要注意的是，組織型態與正當性認同的結合並非中共所獨有，西方國家藉由市民社會來塑造正當性認同，提供公私領域連結的也是組織型的層級模式，兩者不同的是，西方的正當性認同是先由私有產權與個人主義的確立，而後經由市民社會而塑造的，係由下而上的形成，然中共的正當性認同其歷史背景則是揉合了清末對國家認同的尋求，與結合建政後列寧黨國體制的層級組織而成，故認同的形塑係由上至下，而這兩者的共通點，則是仰賴領域劃分的可固定性。

網際網路的興起對兩者的影響就在於此，網路互動的模式與層級結構迥異，它使用的網絡連結剝離、區隔了國家此一行為者的固著領域，從而瓦解了正當性認同，因此當中共希望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以維護其正當性認同時，網際網路反而在過程中有不利的影響，因此即便在擺脫國家力量的干涉以培育社會的自主力量，或是排除共黨對公域的限制而藉由網路暢所欲言，這些有利於市民社會發展的契機，均導源於網路自有的邏輯，是在它以穿透國界束縛的思維下所進行的。

---

<sup>48</sup> 也就是以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試圖將黨國進行再一次結合。有關三個代表的相關檔，參見「中共啟動『三個代表』思想」，未來中國研究，[http://www.future-china.org/spcl\\_rpt/3r/3r-issue.htm](http://www.future-china.org/spcl_rpt/3r/3r-issue.htm) [2002/12/20]